

文史探索书系 · 柯灵 范泉 主编

上海「孤島」文學

● 杨幼生
陈青生

1209.6
23

ISBN 7-80569-733-7/I·210

定价：5.00 元

上海“孤岛”文学

杨幼生 陈青生著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史探索书系
上海“孤岛”文学

杨幼生 陈青生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排印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875 字数 80 千字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ISBN 7-80569-733-7/I·210

定价：5.00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文史探索书系

柯灵 范泉 主编



孤岛时期出版的部分作品及期刊



目 录

引言——特殊环境下的文学	(1)
“孤岛”杂文	(7)
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要题材·杂文 论争·杂文艺术漫评	
“孤岛”小说	(28)
王统照、巴金、芦焚等的作品·“利 用旧形式”的创作·通俗文学作家 群·新人新作	
“孤岛”散文	(55)
写实,表现“孤岛”·思辨,意寓·行 旅,采访·记事,忆念·海外杂记· 巴金·青年散文家·《上海一日》的 出版·外地作家的散文	
“孤岛”诗歌	(80)
“行列社”的成立及其诗歌活动·诗 人诗作	
“孤岛”戏剧	(99)
剧本创作·戏剧演出	
“孤岛”电影	(111)

畸形的繁荣·三个阶段·日伪破坏·爱国文化工作者的活动	
“孤岛”儿童文学.....	(139)
特点·儿歌·童话和儿童小说·儿童戏剧	
结束语.....	(149)
后记.....	杨幼生(151)

引言——特殊环境下 的文学

抗战时期的上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全民抗战时期（1937年8月13日至同年11月12日）、“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3日至1941年12月8日）和沦陷时期（1941年12月9日至1945年8月15日）。上海“孤岛”文学，是指出现在抗战上海第二时期即“孤岛”时期的文学。

1937年11月12日，先前在上海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撤退转移，上海四郊均为日本侵略军占领。但市中心毗连的两个租界，属于英美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北自苏州河，东起黄浦江，南至爱多亚路、福煦路（今延安东路和延安中路），西迄静安寺的“公共租界”英美势力圈；北自爱多亚路、福煦路，东起黄浦江，南至民国路（今人民路）、徐家汇路、肇嘉浜路，西迄海格路（今华山路）的“法租界”。英、美、法为了各自的利益，把两个租界宣布为“中立区”，日本当时也未向英、美、法诸国正式宣战，因而侵沪日军暂时没有进占。这两地租界区，宛如浊浪四围中露出水面的小岛，致

使时人将当时尚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这一小块上海市区，称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正式对美、英、法宣战，侵沪日军也进占租界。“孤岛”终于沦陷，维持四年又一个月的“孤岛”时期也随之结束。

“孤岛”时期的上海，具有十分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影响着“孤岛”文学的特殊发展。

尽管两租界宣称“中立”，并且不允许中国抗日力量及日军和它的傀儡政权在租界活动，但实际上做不到的。租界当局的倾向是否始终“中立”暂且不论。在“孤岛”，中国抗日力量始终在这里展开多种多样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日本侵略者也一直对租界当局耀武扬威，施加压力，将“孤岛”置于他们的凶焰恶氛笼罩之下。因此，“孤岛”上海仍然是敌我进行殊死搏斗的战场，既有文的角逐，也有武的较量。“孤岛”时期，敌伪对上海抗日爱国活动的迫害可谓五花八门：指使暴徒向报馆掷炸弹、寄子弹、送血淋淋的手和注有毒汁的水果，直至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程振章、《大美报》主持人张似旭以及租界法院刑庭庭长郁华、“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等。1940年7月1日，汪精卫汉奸集团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不久，更公布所谓惩治“潜身租界”“凶顽”的通缉令，有83人名列其中，包括好几位抗日前线爱国文化人士，如胡仲持、高季琳（柯灵）、汪倜

然、朱曼华、王人路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汉奸遭到抗日爱国者的狙击，如伪“上海市民协会”要员陆伯鸿，准备参加伪政权的唐绍仪、周凤岐，以及积极鼓吹汪伪“和平文学”的作家穆时英和刘呐鸥等。“孤岛”敌我斗争的严酷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但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在“孤岛”坚持斗争的主要手段，还是文化宣传，办报纸，办学校，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等等。其中新闻出版界的出色斗争，为“孤岛”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初期，“孤岛”新闻出版业曾一度沉闷冷寂，而日伪蛊惑宣传则甚嚣尘上。共产党人夏衍等为了不让敌人轻易地占领“孤岛”这块宣传阵地，于1937年12月9日创刊出版了《译报》，用译载外国报刊有关中国战争形势的报道，对“孤岛”人民进行抗战教育。不久日军通令租界内的华文报纸必须每天送审，《译报》只出了17天，就被迫停刊了。

12月16日，主持英文、华文两种《大美晚报》的美籍人士史蒂发表《责任声明启事》，宣布两报为美人所有，“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日军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给“孤岛”爱国新闻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启发：既然洋商的华文报纸可以不送审，何不借用洋商名义办报呢？于是，1938年1月12日，《译

报》改为挂英商牌子的《每日译报》复刊了。隔了四天，《文汇报》同样也挂英商牌子创刊了。同年10月10日，《申报》用美商名义回上海复刊。其他不愿接受日军检查的华文报纸也相继仿效，纷纷挂起外商招牌，印刷发行。

挂外商招牌的报纸，不仅报道时事新闻，还进一步开辟了种种文艺副刊，如1938年2月10日由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这是“孤岛”战斗性极强的文艺副刊，除刊登散文、诗歌和小说，还几乎每天刊登短小精悍的杂文。同年5月1日，巴人主编的《每日译报》副刊《爝火》又与读者见面。此后，其他文艺副刊接连问世，“孤岛”文学因此也逐渐活跃起来。

利用“孤岛”特殊的政治环境，“孤岛”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还设法出版了一批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出版的书籍，如《资本论》、《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这些书籍，不仅对促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宣传中国革命也起到很大作用。

租界当局有同情中国抗日爱国活动的一面，也有唯恐得罪日军，对“孤岛”抗日爱国活动实施阻挠、压制的另一面。他们不允许明显激烈的抗日言论公开出现，规定报刊中不能出现“敌方”、“我方”、“汉奸”、“日本鬼子”等字眼，只能使用“日方”、“华方”等中性词句，还规定凡定期报刊须事

先送审，获准通过后方得出版等。《文汇报》、《每日译报》等，后来即因强烈的抗日倾向被勒令停刊，一些文艺作品也因此被禁止发行或演出。不过，“孤岛”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也有避实就虚的做法。拿出版刊物来说，为躲过租界当局审查核准这一关，不便出期刊就出丛刊，因为丛刊不须审核登记。从1939年5月共产党人戴平万编辑出版“新中国文艺丛刊”起，一批抗日爱国文艺丛刊能陆续问世，其原因即在于此。有些抗日爱国文艺书籍的出版，为避免租界当局的阻挠和日伪的迫害，还假托有名无实的书店，如钟望阳化名柯狄，出版讽刺汪伪汉奸政权的《新木偶奇遇记》时，所署的“玩具书店”，就是如此。

在四年又一个月的“孤岛”岁月里，上海总共创办过百余种文艺刊物，包括40余种报纸文艺副刊，90余种文艺期刊，10余种文学丛刊。这期间，上海作家写作、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成千上万，仅辑结出版印行的散文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小说集、剧本集、诗集、评论集和中、长篇小说单行本，就有近百种。这还不算上海作家在外地发表、出版的作品以及各地作家在上海发表、出版的作品。仅从这些简单粗略的数字统计，也可以看出“孤岛”文学在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许多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作家，也真诚地拥护

抗战，身体力行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并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孤岛”文学的发展壮大和丰富多采作出了贡献。例如，中国早期新文学社团“弥洒社”的主要成员胡山源，一向与世无争，超脱政治，热心教书治文，温文尔雅，这时也公开表示：“像我这样的文人，除了会执笔写几个字以外，其他一无所能，对于国家社会，实在很少贡献。假如我能够不自暴自弃，不自甘堕落，不丧良心害人，肯拿出我的起码技能，作一些事情，……那我就可以因此自慰，聊以解嘲了。”^①他创办过《红茶》，长期主编过《申报·自由谈》，写出不少积极宣传抗日爱国的文学作品，还热心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在二十年代被新文学阵营视为旧文学卫道士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作家，这时也以新的精神面貌和文学风采出现，成为“孤岛”抗日爱国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

在“孤岛”极其艰险困苦的环境中，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正是凭藉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真诚，用他们的勇敢和智慧，谱写了“孤岛”文学的瑰丽篇章。

① 胡山源：《红茶的由来》，载1938年6月16日《红茶》创刊号。

“孤岛”杂文的产生，与当时的“孤岛”政治局面、社会思潮、民族“代表”人物、文学潮流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从“孤岛”时期的一首长诗《孤岛》（胡风作词，黎澍作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孤岛”杂文产生的背景：

孤岛杂文

——“孤岛”杂文的产生与发展的三个阶段

“孤岛”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杂文更是时代的产物。”“孤岛”特殊的政治局面为杂文这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土壤。不过，由于“孤岛”政治局面的十分复杂而曲折，“孤岛”杂文的发展也经历了高潮——低潮——高潮这样三个阶段。

“孤岛”杂文兴起于1938年2月，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创刊。创刊的前一天（2月10日），正碰上敌人向文汇报馆扔了一颗炸弹，第二天《世纪风》与读者见面，第一篇就是编者的《纸上漫步》：

“孤岛”是用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的？——手榴弹。

手榴弹，在近一两个月来，曾经完成过不少大快人心之举。可是现在，连那些卑污的手也使用着它了。

但这给予被击者只有光荣。

可惜圣洁的手榴弹被他们所亵渎了。

了三段四句，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显示了编者临难不畏的浩然正气，也为“孤岛”杂文奠定了战斗的基调。这个副刊几乎每天有一篇花边杂文。

5月1日，巴人主编的《每日译报》副刊《爝火》又在“孤岛”崛起，几乎也是每天一篇杂文。7月1日，《爝火》改名《大家谈》，主编仍是巴人，评论时局、干预社会更为积极。《每日译报》上由亭长(恽逸群)主编的另一副刊《前哨》，文学性更浓些，也时有杂文发表。此后，其他文学期刊和副刊，如雨后春笋，蜂然而起，这就形成了“孤岛”杂文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从1938年春夏到1939年夏，“孤岛”杂文的特点是：以鲁迅式杂文为代表，在当时各种文体中锋芒最露、风格最尖锐泼辣，既有对敌人、汉奸的揭露，也有对抗战阵营内部各种消极因素和人们灵魂中种种弱点的针砭。以1938年11月出版的六人杂文集《边鼓集》为例(它的六位作者是：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屈轶即巴人、柯灵、凤子即唐弢)，在181篇杂文中，揭露侵略者残暴与虚弱的有38篇，揭露汉奸丑恶及阴谋的有22篇，两者共占33%；针砭社会丑陋现象的19篇，揭露冒头的分裂挑拨言行的11篇，两者共占16%；此外，歌颂和议论爱国行为的17篇，占9%，纪念鲁迅及其他文化人士的文章8篇，占4.4%，批评抗日阵营内部极左观点的也有3篇，占1.6%。由此可以大致看出这一时期杂文题材的一般比

重。

这段时期，在杂文方面还开展过三次大的论争。最大的是关于抗战开始以后，还需要不需要“鲁迅风”杂文的争辩。其他两次，一次是关于周作人投敌的议论，一次是内地对梁实秋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批判在“孤岛”引起的反响。

1939年5月18日，由于《译报》、《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中美日报》、《大美报》等刊登了蒋介石的生产会议广播演说，被租界当局命令停刊两星期。其中《译报》、《文汇报》，由于复杂的原因，从此停刊。这两个主要杂文阵地的失去，对“孤岛”杂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同年1月11日创刊的《鲁迅风》（部分杂文作家的同人刊物，先后由文载道和石灵负责编务）继续出版；同年7月1日，周楞伽主编的《东南风》创刊，也常刊登周木斋、列车等的杂文；陶亢德、周黎庵等负责的《宇宙风》（乙刊）（同年3月1日创刊）也开辟了“杂感”、“随感”一类栏目，但“孤岛”杂文的声势，已明显减弱。《鲁迅风》出到第19期（1939年9月5日）停刊；《东南风》则只出了四期（1939年9月10日）。1939年12月1日，柯灵继《世纪风》后，接编了《大美报》的副刊《浅草》。这仍是杂文作家们的一块阵地，但这里刊出的杂文，比起《世纪风》来，相对已显著减少，不是每天都有了。1940年4月，由